

解构的力度与价值的失衡

——重评新写实

曹小娟

(厦门大学中文系 厦门 361005)

摘要: 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引发了一场批评的盛宴, 热闹而喧嚣的背后, 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被无形地遮蔽了。新写实小说以历史循环的时间观作为根基, 解构了集体的乌托邦叙事, 揭开了一个个体自由言说的时代; 新写实作家对现实的暧昧态度消解了小说应有的批判锋芒与力度, 这是新写实小说成就不高的主要原因; 新写实小说注重小说的“自我表现”, 继承了先锋小说对形式的青睐, 而又摒弃了简单的模仿。

关键词: 新写实小说 时间观 叙事

新写实小说是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崛起的一个小说流派, 新写实的出现引发了当时理论批评界的空前繁荣, 被批评家归入这一流派的小说家斑驳陆离, 致使“新写实”这样的一个流派命名似乎有些大而无当。在这个批评的盛宴中产生的一些批评话语已经进入了文学史的叙述, 形成了一定的霸权, 使得新写实似乎更加错综复杂、光怪陆离。本文试图拨开昔日批评的迷雾, 再次感受新写实小说。

一、停滞的时间观

19 世纪末,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正式将进化论介绍给国人, 进化论被广泛地解释和应用, “革命”二字的基础就是由进化论演变而来的进化的时间观以及进化的史学观, 进化论为“革命”提供了一个美丽的乌托邦。进化论演进而来的进步的时间观逐渐替代了中国传统的循环史观, 由此亦在语言上派生出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语义场, 对 20 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在新文化阵营中最先敏锐地反思这种进步时间观的是周作人, 周作人推崇晚明文学, 认为“五四”文学是晚明文学的循环, 并且最终从新文化运动中急流勇退, 回归到自己的园地, 但是进化的时间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进化的时间观、革命的乌托邦、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迅速结合, 造就中国 20 世纪小说叙事中常见的“光明的尾巴”, 左翼文学以及延安文艺乃至抗战文艺大都体现出这样的光明的结局。进化的时间观对文学的影响突出地体现在 17 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中, 这个时期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都具备一个进步的叙事模式, 结局肯定是敌人失败了, 我们胜利了。这种模式抹杀了我国战争题材小说深刻的文化意义, 小说缺乏那种个体生命、民族意识、道德传统之间惊心动魄的斗争与张力, 其道德判断简单而缺乏深刻性, 很难引发读者的思考。进步的模式几乎贯穿了 17 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中, 小说、诗歌、散文无一幸免。80 年代思想解放了, 然而配合政治运动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改革文学仍然受到这种模式的影响, 受难意识、对未来的期待以及坚定不移的信念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

收稿日期: 2009—01—08

模式，二元对立的观点仍然左右着思想文化界。新写实小说的时间观是一种停滞的、循环的时间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过去那种乐观、进步的时间观的重新思考，循环的时间观将进步的时间斩首，让时间重新回归生活，从根本上解构了曾经信誓旦旦的乌托邦美丽图景。

池莉的《烦恼人生》巨细无遗地叙述了主人公印家厚一天的生活，这一天的生活所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人生中某个特殊的一天，它是生活中最平庸的一天，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循环下去。小说对那些过分地夸大个人力量的乌托邦想象嗤之以鼻，人绝不可能完全把握自己的生命历程，“老婆，我一定要让你吃一次西餐，就在这个星期天，无论如何！——他没有把这话说出口，他还是怕万一做不到，他不可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但他将竭尽全力去做！”^①在那个主体性高扬的年代，印家厚却无法主宰自己的人生。小说对人生的诠释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海氏认为人存在的本真的情态是“烦、畏、死”，而印家厚的生活就是由这样的烦与畏构成的，不同的是小说中的悲观色彩借助于后现代的反讽被作家轻易地抹掉了，没有滑向彻底的悲观主义。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官场》、《官人》等系列小说中主人公没有正式名字，抽象的代号表明了这不是一个特殊的事件，任何读者都可以轻易地将自己安插在主人公的位置，而小说的意义仍然可以建构起来。这样一群缺乏指称的人物，以及随时可以置换的时间指涉，构成了一个循环的时间叙事，事情的发展并非是一个进步的过程，生活中种种偶然性的事件不停地干涉人物的生活，人在这样的生活面前显得渺小而不值一提。抽象指称所带来的无法回避的命运之网，不管当年的我们多么豪情万丈、信誓旦旦，然而无人能逃避生活与命运的改造，宿命论的色彩在文本当中慢慢地延伸。

循环的时间观所带来的宿命论色彩在刘恒的小说中表现的最为突出，刘恒的《狗日的粮食》没有明确的叙述时间，只有一个洪水峪的地方，农民杨天宽用 200 斤谷子换来了媳妇瘦袋，瘦袋女人在那个闹饥荒的年代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到处偷东西，养育的六个儿女都有一个与粮食相关的名字，但是这个好强的女人却因为丢失了掌管全家生计的购粮本而寻了短见。女人生命的意义从 200 斤谷子开始到最终因为购粮证的丢失而消失，小说摆脱了进化论式的时间叙述而呈现出一种生命循环的历史发展过程，震撼人心的悲剧效果在历史循环的基点上被无限地放大，生命中不可预知的宿命意识弥漫在小说中。受到长达多半个世纪蛊惑的人们开始渐渐意识到那种遥不可及的乐观意识与真实的生命以及生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到底该如何去思考生活的轨迹，作者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多元化的思考维度：杨天宽由最初认识瘦袋女人的凶狠以及后来的不坏，他思想的变化最终受制于生存问题，而不是过去我们所倡导的绝对的二元对立的“荣誉”意识与“道德”意识，生命的意义在生活中呈现出多种的解读方式，过去的那种是非标准失去了威力。

方方《祖父在父亲心中》有这样几句震撼人心的话：“其实，他艰难地行走的路乃是一条不通向任何地方，而直指死亡的路。他存在的意义是他行进时痛苦而扭曲的姿势。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②方方在这里指出生命最终指向的是死亡而非其他，而“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反映出作者对进化的历史观的否定与嘲弄。祖父在父亲心中形成的“英勇”的姿态使得父亲一生都活在阴影之下，在高扬的榜样面前，个体的人无地自容，只能结束生命来摆脱高尚道德对个体心灵的钳制，这是一种变相的道德观作祟的结果，政治的蛊惑以及乐观的理想将个体的选择压制到零点，“五四”所倡导的个体解放所沾染的政治色彩最终将人的个体性完全泯灭。新写实小说的功绩就在于完全地解构了集体理性，将人从集体中解放出来。解志熙《印象与妄谈》中已经注意到刘恒小说《白涡》中的个人主义成分：“实际上，在一个虽然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但却缺乏基本的现代组织，因而尚须现代化的国家里，过分张扬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而完全否定个人的私利观，那是反历

① 池莉：《烦恼人生》载金健人：《新写实小说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21页。

② 方方：《祖父在父亲心中》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96页。

史的。同样，在一个走向现代化，走向自由开放的社会里，个人的发展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需的。”^①这篇发表在1988年的论文的确是有些与众不同，当大家都在谴责周兆路的时候，论者独辟蹊径，发现了个人主义在当时语境中的困惑。应该说，结束了那种进化的想象之后，人们才将自己从长长的链条中剥离出来，在有限的时间中发现了个体的价值与意义。

循环论的时间观彻底摒弃了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之上各种价值观，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再展望未来，而将眼光向下，开始思考生存的诸多问题，生存的问题恰恰是大半个世纪被我们遗忘了的本质。如果说先锋小说是通过叙事技巧而逃避主流文化以及宏大叙事，那么新写实小说则是釜底抽薪，将赤裸裸的个体生活和盘托出，彻底挣脱了主流文化的影响，有关政治化的宏大叙事不攻自破，“返回到个人化写作的‘新写实’小说，不再有构造‘本质规律’的乌托邦冲动”^②，新写实结束了集体想象的时代，大写的人终于转换成为小写的个人。

二、隐蔽的批判

评论家一直对新写实小说家冷静的描写颇多微词，“回避主观判断”、“创作主体的退隐”、“缺失的价值判断”等等类似的结论都在指责新写实作家的平庸主义倾向，但是却很少有评论家能真正读出个中滋味。新写实小说家首先是想借助于小说叙事技巧来真实地描绘生活，因而大多数作家都选择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的方式，即叙述者选择小说中的一个物作为叙述视角，人物不知道的，他无权叙述，在叙述的过程中叙述者有权描写视角人物的心理活动。而评论家所声称的那种完全不加各种评论原汁原味地描写应该是热奈特所言的外聚焦，即叙述者假装自己是一个无权发表言论的旁观者，不可以直接或者借助人物干预叙述，这种方式称为纯客观叙事，可用“叙述者<人物”这一公式来表示。新写实小说家采用的是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并不是很多评论家所声称的那种“忠实地记录”，不过作家选择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如果能避免过多的叙事干预，也可以给读者带来一种冷静的真实，新写实小说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频繁的说教，从而缺失明确的意义指向。然而当我们从接受的角度来审视新写实小说，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论。

王干最早提出新写实小说中读者接受的问题，他借用布莱希特的术语“共同作业”来解释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重要地位，^③但是依然没有发现新写实小说的批判意识，尽管方方曾经强调过：“把生活中的一切都写出来，摆在大伙面前，供读者批判。”^④刘震云在“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座谈会上说过一件很少引起评论家注意的事情，就是日本《读卖新闻》的一位学者曾这样评价他的小说：“《单位》真是奇特，人物都这么变形、异化，这么奇特地生活着，是部标准的现代派作品，但中国人就不觉得《单位》奇特，因为大家都这么活着。”^⑤当我们还在沸沸扬扬地讨论“真实性”的问题时，日本学者已经读出了我们难以企及的深意，不管是对过去的叙述还是对当下生活的敏锐感知，新写实作家都描写出了中国人畸形的生活状态，只是我们读出的是我们认为的真实生活，无形中把一种畸形的生活方式当成了我们正常的生活方式。小说《祖父在父亲心中》的父亲一直把祖父当做榜样，这个榜样是在特殊年代里树立起的典型，这个高大光辉的形象使得父亲在那个无法反抗的年代对自己的懦弱产生了强烈的厌恶与鄙视，与其说父亲死在自己父亲的阴影之下，不如说是当时树立起的榜样与日后并不需要这种榜样的冲突，父亲终于在这个两难的选择中迷失了自己。而方方在小说中强调父

① 解志熙：《印象与妄谈》《文论报》1988年3月15日。

② 陈晓明：《反抗危机：“新写实论”》，《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

③ 王干：《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④ 丁永强：《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⑤ 丁永强：《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亲走了，将孤独与寂寞留给了母亲，父亲是那个年代心灵扭曲的代表。池莉的小说《你是一条河》集中反映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严重对立，母亲辣辣为了养活一群孩子，不得不靠各种降低尊严的方式去满足生活的需求，在这个与生活作斗争的过程中，辣辣对那些可以帮助解决生活问题的孩子尤其是社员疼爱有加，但是忽略了其他孩子的感受。孩子虽然都长大了，但都活在严重缺失母爱的阴霾之下，咬金为了得到母亲的注意，花大把大把的钱给家里买各种高档的家具、电器，年老母亲终于在台湾言情剧的潜移默化之下，依稀发现了自己对儿子的忽视。小说中母亲与冬儿之间的矛盾，突出地反映了在生存难以保障的情况之下，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压制，为了生存母亲讨厌冬儿的清高，亦对叔叔王贤良的情诗不屑一顾，而叔叔与冬儿之间的互相理解是对生活诗意的尊重，虽然冬儿最终原谅了母亲，但是这种畸形的生活、崇高的丧失、精神的放逐让生活变得毫无诗意而言。

刘震云的小说大都体现出在日常生活中“物质”对“精神”的压制，《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是大学毕业生，自视清高，一次他在菜市场意外碰到当年的学生诗人小李白在卖鸭子，两个人的对话饶有趣味，小林问小李白还写诗不？小李白说：“狗屁！那是年轻时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淡！如果现在还写诗，不得饿死！”^①这一句话道出了生存的真实，大学时代的激情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消失殆尽。小林从开始的不愿意帮小李白收卖鸭子的钱到后来竟然喜欢上这个高收入的工作，小李白与小林的转变折射出物质社会对人精神生活的压制，人们几乎不再去关注内心以及曾经的梦想。方方《风景》中的七哥为了改变命运而娶了一个不能生育、自己不爱的女人，从古到今的中国社会中，不乏七哥这样的原型，非正常的生活变成了一种正常的现象，方方说“其实大多数人都不知不觉地被异化而来，不合情理的东西大家都习惯了，合情合理的反而变成了不合情理，别人不把你当人看你觉得很正常，别人对你笑脸相迎，你反而会怀疑他居心不良。所以认可现实，但不满现实，而批判现实则是为了改变现实，使现实变得更美好一些”。^②“含泪的微笑”当中难道我们只看到微笑吗？^③我们一直认为这就是正常的生活，我们感受不到生活中那些摧残人性、挤压梦想扭曲的现实。现代小说优于传统小说的优点就是将读者的地位凸显出来，放弃小说的教化功能而借助于读者的参与来完成小说意义的阐发，当然不排除作家一厢情愿预设的较高等级的读者群，先锋小说就是过高地估计了读者的接受能力而最终风流云散。新写实小说揭示了中国人生存的隐疾，然而中国评论家却没有像日本学者那样读出其中的深层含义，评论家作为理想的读者群都如此，又怎能对普通的读者有所期待呢？

但是在这个未达成一致的阐释过程中，亦很难排除作家自身的问题，因为“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不仅不加强我们的种种既成认识，反而违反或越出这些标准的认识方式，从而教给我们种种新的理解代码。”^④新写实作家的立场恰恰处在模棱两可之间，他们以冷静的叙述向我们展示现实中不自由的生活状态与诗意沦丧的生活模式，进而试图唤起读者的自由意识。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欣赏的姿态，比如池莉的《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以及刘恒后期的《贫嘴张民的幸福生活》等等，叙述者不经意间泄露出的那种小农意识支配下的自豪感颇能迷惑一部分读者，因而小说并未完全导向那种真实的、深刻的批判，这才是新写实小说失败的关键之处。这也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双脚着地的思维模式无时无刻地束缚着作家想象的翅膀，间接导致了新写实这种中西结合的怪胎，试图挣脱的愿望最终以回归而告终。

① 刘震云：《一地鸡毛》载金健人：《新写实小说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28页。

② 丁永强：《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③ 孟繁华：回望“新写实”，《小说评论》1995年第5期。

④ [英]特利·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7页。

三、作为叙事的新写实

当批评家热烈地用各种主义去界定、讨论新写实的诸问题时,《钟山》杂志迅速捕捉到话语权:“在商品经济和某些不健康的俗文学之潮的猛烈冲击下,文学正面临着少有的寂寞和疲软。当此之际,人们不能不关注不思考:文学如何从目前的低谷中走出来?根据我国当前社会的发展过程,和文学的发展趋势,本刊将从1989年第1期起举办‘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努力倡导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具有当代意识、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又贴近生活关注现实的新写实小说。”^①至此,“新写实小说”的命名产生并获得认可,然而这个命名是含混不清的,这仅仅是一种折衷或者说是一个偶然的命名。先锋小说家以及90年代新历史主义的一些作家之所以也被归入这一流派,原因就在于这一命名的宽泛性,这一命名是在与现实主义的对比之下彰显出来的,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新写实小说所汲取的西方小说资源。

新写实小说被评论家所津津乐道的是“原生态”、“生活流”等等类似的描述,这些描述很容易将“新写实”小说与现实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相联系起来,事实上,大多数评论家都善于从自己熟悉的现实主义入手解读新写实小说,自然主义也一度成为评论家关注的焦点。这种解读方式无形中遮蔽了新写实小说家形式革新的初衷。中国现代批评话语以及批评方式是舶来品,远在“五四”之初西方各种主义思潮都涌入了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的宏大主题与庙堂意识之下首先选择了社会学的批评模式,诸如茅盾对泰勒的情有独钟。对作者生平的探究、对客观的社会环境的重视以及对终极意义的追寻构成了批评的主要模式,作家成了批评家的上帝。这种批评模式在文革当中被无限制地夸大,小说的叙述者与作者混为一谈,导致种种文坛悲剧。1985年左右,西方思潮再次冲击干涸的中国理论界,作家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春天的气息,此时的批评家在面对日新月异的小说创作时显得捉襟见肘,理论上普遍准备不足让这一时期的批评呈现出不伦不类的趋势,内容分析加上不痛不痒肤浅的形式批评充斥着评论界。有关新写实小说的命名层出不穷,各种主义满天飞,许子东的一句话道出了实情:“我们还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吧。”^②在各路评论家都费尽千辛万苦去套用现实主义来界定新写实时,一个中心的问题“真实性”就被无限地扩大了,毕竟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都强调真实性原则,但是一谈到真实性的问题,所有问题变得扑朔迷离、错综复杂,何为真实性?真实性何在?为了挽救民族的命运,为了唤醒国民的意识,“真实”几乎是每一个作家写作的标准,当作家为了一个民族的崛起放弃自己的自由而后又为了自救放弃曾经坚持的“真实性”原则时,真实变得毫无意义可言,“原生态”、“还原生活本相”这些看似归纳出了新写实小说的一些特性亦在叙事学面前不攻自破。

或许我们被先锋小说的叙述技巧搞得头晕目眩,因而在新写实这里形式的变革就变得无足轻重,我以为新写实值得关注的首先是对现代小说表现形式的自觉追求,就这一点而言,先锋小说与新写实小说的功绩是相当的。中国小说由传统走向现代已经在五四之际完成了,但是战争的岁月以及后来泛政治化的年代无形中割断了这种转变,那些急功近利的革命小说以及图解政治的宣传小说已经渐渐地退回到传统小说的说教模式中,二元对立的观点、充满意味的说教倒使得作家的地位迅速飙升。20世纪80年代社会的急剧转型,读者不再满足这种填鸭式的阅读方式,那么新写实注重自我“展示”的价值就变的异常重要。新写实小说追求小说的表现艺术,在叙事上试图达到一种客观化的真实的叙事,这种避免过多说教的“零度叙述”无疑会加深读者对文本的信任,从而将读者的地位在文本的意义建构中凸显出来。

① 《编辑后记》《钟山》1988年第6期。

② 李兆忠:《旋转的文坛——“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纪要》《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在某种意义上，‘新写实主义’得益于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要远远大于经典现实主义他们那种追求绝对客观化的写实态度，未必是在认同现实主义原则，而更有可能是在向‘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暗送秋波”。^① 晚于先锋文学的新写实并非是小说创作技法上的回归，而是将现代的小说技法熟练地运用到小说创作中，那种不动声色的汲取与融汇更符合中国读者与评论家的口味。1989年有评论家指出：“先锋作家一而再、再而三地模仿西方现代派小说，终于使读者和评论界失去了耐心，”^② 先锋小说一味地追求形式的创新在模仿尽头失却了自我，新写实小说的形式变革超越了简单的模仿，正如有些评论家所言：“与其说新写实小说（准确点讲，特指‘新写实’初期基本符合概念界定的那部分小说）是反驳‘先锋小说’，不如说‘新写实’是先锋小说适者生存的延续和变种。”^③ 就现实主义而言，新写实显然不如先锋小说逃离的那么干干净净，所以才导致评论界的混乱与无序，然而我们应当关注的并非是那点仅有的神似吧。

新写实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小说流派，所谓承上指的是新写实作家延续着 20 世纪 80 年代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以及社会责任感，而启下指的是新写实成功地开启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个性化主潮，至此，后现代主义的那种解构一切的浪潮席卷了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新生代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群体。对新写实做任何单方面的思考都会背离新写实作家的初衷，虽然新写实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是很高，其创作成就也不是很突出，但是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分子，我们应该还原新写实的真实面目，肯定新写实对当代文坛的贡献。

（责任编辑：王向辉）

① 陈晓明：《反抗危机：“新写实论”》，《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

② 李兆忠：《旋转的文坛——“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纪要》，《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③ 陈旭光：《“新写实小说”的终结——兼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命运》，《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